

访谈

吴国光
杨子立

“中国模式”： 历史与跨国 比较的检讨



吴国光



杨子立

编按：中国自称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将其称为“中国模式”，声称它有不同于西方的巨大优势。是否存在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如何看待它的“优势”？它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未来？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杨子立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国光教授在1980年代曾深度参与中共的体制改革，是研究中共制度变革问题的专家。

杨子立(以下简称杨)：今天主要是向您请教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我们先谈谈“中国模式”的性质和特点。

对于“中国模式”，有些学者甚至连这个概念都不认可。黎安友教授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反现代化的现代化”研讨会上说，“中国模式”根本没有人去学，所以谈不上是一种普遍性的模式。

当然也有人称赞“中国模式”，包括某些外国学者，例如与清华大学有合作关系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

那么,对于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以及大家公认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共产党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等,您是什么观点?

吴国光(以下简称吴):我也不喜欢用“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一定要用的话,那么我和黎安友教授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么一种“模式”。国际上,1960-1970年代的台湾、南韩、新加坡,其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也是政治上没有民主,但经济上实行市场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并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是在维持政治专制的情况下实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并因为融入全球化而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与其说是中国的独特模式,不如说中国沿袭了其他很多国家过去已经做过的事。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看,这种发展也不是今天独有的。我观察,中国从清末以来大体有三个大的轮回。每次轮回都是开始于全面和深刻的危机,当局不得不实行变革。起初往往各个方面都希望变革,所以变革比较全面,包括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但是这必然触动掌权者的利益,于是就会发生政治冲突。在当局以强力手段压制冲突、拒斥政治变革之后,当局实际上还是要实行进一步的经济变革,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

杨:请把历史上这三个轮回介绍一下。

吴:首先,清末面临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面危机,这才有了清政府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又推进到戊戌变法要搞政治革新。这导致政治矛盾激化,保守的当局反手要把政治革新打下去。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继续推行自强的经济政策。因此在清末中国有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严重腐败等社会问题。经济自强并不能解决

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最终走向辛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是民国建立以后，仍然面临内忧外患等各种危机。当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深刻变革的声音以“五四运动”为代表，各政治派别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都很大。这也引起了各种政治冲突，后面的北伐、国共第一次内战等也是这些政治冲突的表现。到1930年代前期，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当好，融入了那一轮的全球化。但腐败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还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矛盾，最后共产主义革命借着抗日战争的机会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轮回是毛泽东时代的晚期，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各种危机，经济十分落后，社会上普遍不满。所以在1980年代出现了上下呼应的毛后改革，当时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想变革等多层次的改革要求。但是这就引发了政治冲突，结果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镇压。

此后，中共当局完全拒绝政治改革，强力压制思想变革，只是单轨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这就出现了后来所谓的“中国模式”。

因此，从历史轮回的角度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已经三次出现过这种模式了。

这里强调的是，你的发展道路既然和台湾的、南韩的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你有什么资格叫“中国模式”？既然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繁荣，在内在机制上和1930年代、1900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之为“模式”？从历史上的三个轮回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并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在经济单轨推进、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能克服严

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我不敢预言说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这样的前景，但是很明显，中国没有走出20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轮回现象。

杨：您提的三个历史轮回的说法挺新颖，也挺有价值。第一个和第三个肯定是制度上顽冥不化、只改革经济的情况。这虽然造成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最终还是要垮塌。

但是，第二个轮回即民国时代，略有不同。虽然国民政府是个威权主义政府，但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包括日本入侵，还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学说，最终国民党还是要搞宪政的。假如说没有共产党的革命，第二个轮回也许能够跳出来，只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您觉得第二个轮回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性，将来中国的民主化也要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也要走宪政的路才有可能？

吴：中国要解决各种危机，就只能走宪政的道路。至于第二个轮回的特殊性，实际上每一个轮回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很大的差别。横向来比的话，台湾在实现民主化以前，也成功地实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二战之前中国的发展在台湾的延伸。最后走通了宪政道路，并不是和它的发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其他很多重要因素。

在1980和199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不断加深经济联系。当时认为，中

国的经济实现了现代化,即便有些曲折,但是大方向上一定会导致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宪政的未来。今天来看这个假设显然不成立了。现在,恰恰是中国相当程度的经济现代化给了现政权巨大的力量,使得习近平上台以来有野心要对抗整个国际社会。

杨: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读过您的《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是2002年写的。文章说,到1990年代中期,从制度的角度上来讲就已经没有改革了。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中共发公告说,改革的目标是国家治理。拿治理来代替了改革,也就是宣告没有制度性改革措施了。既然制度上没有再改进了,可以说模式形成了。还有,从学术上来讲,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北京共识”,于是更多的人把这作为“中国模式”论形成的开始。您认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模式”的形成更有意义?

吴:我不大赞成“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也就很难断言“中国模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关于改革的终结,我想,把这个问题稍加分析,就能够看到中国所走的道路在历史上是如何动态地发展的。

2001年秋冬,我在一个座谈会上首先提出中国改革的终结,接着写了2002年这篇文章。我的论断是,中国的改革到2001年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就终结了。好多年来,很多人不同意这个判断,理由基本上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是,经济改革结束了,但还有政治改革。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政治改革在1989年天安门就已经举行了一个血腥的葬礼,那时就已经终结了。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促使中国进一步转型和深化改革。我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顶多会做一些行政措施上和某些法律程序上的小修小补，不会有进一步的制度转型。

中国要搞真正的改革，首先就要改革一党专制，这是政治改革。其次是经济改革，就是改变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两样才叫改革。你不能什么都叫改革，现在有人要把回到毛体制也叫改革，那就偷换概念了。

在1980年代，虽然没有对一党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但开始引进这样的变革。比如说1987年提出的党政分开，它其实是对一党专制的挑战。可惜到1989年政治改革就完全终结了。

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促使中国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后来我在2017年用英文写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里做了系统的回答。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为什么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使它进一步转变为民主宪政的国家，反过来它却能侵蚀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以至于西方民主在全球化之后又遇到中国的严重挑战。

我2002年提出这个论断时，很多朋友不赞成，大家对政治改革抱有幻想。到2004年，我写了《再论改革的终结》，提出了“两次改革”论。中国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是由民众自下而上推动，当局也自上而下配合。这次改革再一个特点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和国家计划经济体系的框架下，整个社会不断地有改革经济来动摇其政治框架的冲动。

1980年代不断有学潮,当时知识分子提出要非毛化。另一方面,当局则开展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压制经济变革的政治和思想后果。

1989年天安门镇压宣告了第一次改革的终结。然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没有任何改革,甚至倒退到要把第一次改革期间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打下去。那时候民营经济规模还非常小,不过是“傻子瓜子”这样一些小商小贩,江泽民当时表态说要把这些人罚得倾家荡产,要反和平演变,要在农村搞类似人民公社的再试验。

中国的第一轮改革,是从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开始的,他们反攻倒算也针对这个。至于政治改革上的反攻倒算就更多了。比如说在1987年政治改革中,政法委降格为政法小组,而且明确宣布政法小组不再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只是为当局的法律工作提出政策建议。但是1989年以后马上恢复了政法委,而且其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周永康的时候权力大到连党魁都掌握不了他了。

杨:对,我记得当时还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明显是要回到改革前,因此才需要第二次改革。

吴:看一下那三年经济发展的数字,这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经济增长以来,增长曲线在那三年形成一个马鞍形,那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也就每年平均2%或3%的样子。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次掀起了改革——这就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持续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体也是10年。

第二次改革的发起形式与第一次很不一样。邓小平跑到深圳去讲了一通，再次改革就开始了。不是老百姓去推动的，而是一个虽然没有任何官位但仍然可以是独裁者的人，以一己之力，依靠军队的支持，告诉现在的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样把改革推动起来了。

当然，第一次改革为第二次改革奠定了民意基础。邓为什么跑到深圳去讲？因为深圳是第一次改革留下的非常好的遗产。深圳当时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有变革，1988年的蛇口风波显示了这一点。

第一次改革以农民自发反抗人民公社开始，而第二次改革则以大批官员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纷纷下海开始。这就确定了第二次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权力来攫取市场利益。第二次改革还有一个特点：由于世界共产主义的垮台，全球化兴起，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政治权力也和西方资本结合到一起了。

所以说，第二次改革的特点和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民众推动经济制度的变革来一步步扩展自己的权利并推动政治上可能的变革，而是当局的精英把权力置换为市场利益，也形成了官员吃肉老百姓跟着喝汤的分配模式。

在邓小平的“六四”镇压之后，他压制了对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放开市场给予人们发财的机会。逻辑上，它不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去挑战政治专制，而是在政治专制的严密控制下给你经济自由，让你发财，但不要谈政治。

冷战结束后，西方也认为民主制度不再有政治上的挑战者了，热衷于占领市

场。这和邓小平的想法是相互吻合的，那么就带来了中国1990年代以后的高度经济繁荣。

杨:那您为什么说2001年加入世贸反而成为改革的终结呢?

吴:因为中国的权力和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相互融合不再有制度障碍了。当然,这个融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还有一个过程,但是两者融合的制度性障碍不存在了,所以,中共就没有必要把制度变革进行下去了。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中国模式”,那就是共产党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么一个模式。它的形成标志有两个:前面的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把共产党专制这条政治红线确定下来,后面的就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经济开放从制度上铺平道路来用权力吸纳国内外资本。这两样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维持一党专制、经济上加速融入全球化的模式。

杨:您谈到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它在制度上只是小修小补,但是也有人觉得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它还要做很多调整,以便跟世贸组织要求相匹配,比如说物权法的出台、政府信息公开等。像这些改革措施,您认为算是制度改革吗?

吴:体制改革的官式英文翻译是system reform,就是系统的改革。那些小修小补就不再是系统的了,就不是所谓体制改革了。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治理的过程当中都会不断推出新的法律和政策。像美国这样成熟的政治经济形态,也会不断地有改进,美国国会也在不断地推出关于国家治理的新的议案和法律。法国现在则正在进行退休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在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不断修补的过程,不是对于基本框架的变革。我们讲的中

国毛后时代的两次改革,都是针对基本制度框架的;第二次改革虽然维护一党专政的政治框架,但变革了国家计划经济这个基本经济框架。

物权法第一次在中国以某种程度上把私有产权写入法律,当然带有突破性,但是有没有和它相配套的系统性的改革?没有。保护产权除了写入物权法,甚至在宪法里也有一点,但是中国的私有产权是否受到了整个体制的保护?不说别的,私有产权如果受到侵害,能不能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得到保护呢?受害者能不能行使其各种公民权利来保护自己的产权呢?没有这些方面的配套改革,物权法可以是一句空话。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私有产权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压和剥夺,物权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吗?其实,据我观察,这种对私有产权的打压和剥夺,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就在发生。比如说孙大午案件。当然,在习近平治下,程度大大增加了。

实际上,在中国,法律文本并不是制度,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法律就是制度,大家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在中国,必须要有权力配置上的变革,才能够使得相应的法律真正成为制度性的东西,成为游戏规则。

再比如信息公开,中国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之类的,可是,你真的去要求信息公开时,实际上政府会公开多少信息呢?它可能反过来把要求信息公开的公民抓起来!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时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欢呼。但这不过是耍了个花招,到现在中国人大也没有批准这个公约。他只是玩了一个西方式的游戏来骗西方人:我的政府加入

了,但我的议会不批准。

杨:您刚才提到中国加入世贸后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已经没有制度障碍了。可不可以说,这是“中国模式”显示出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些研究者把“中国模式”的优势归结为权力集中带来高效率。您认为这真的是优势所在吗?

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得很好。这之中有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我刚才讲的是改革到了加入世贸组织就做完了。那么,前面做了以后,后面它就会带来一些好处。经济制度上的变革,一直到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市场化,包括产权上的变革,还有融入全球化,这些都带来红利。胡锦涛的十年,基本上就是在吃中国改革的红利。

再有就是中国本来就存在的红利,比如说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的占比也非常大。一般来说,西方资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训练是比较不错的。在毛的时代,政权统治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当统治放松以后,民众的能量就焕发出来。

至于中国这样一套发展模式的优势,我认为其实也是它的最大缺陷。我后来又写过一篇《三论改革的终结》,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为“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另一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专制。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经济发展,包括根本不在乎环境污染的代价,不在乎贫富高度分化的代价。此外,还有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非常恶劣的后果,还有

中国的社会信任的代价。人们互相之间的信任现在已经低落到街上倒下一个老人你都不敢去扶。还有社会不公正、公共健康等等。后一方面，不光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还有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型传染病危机。这些并不都是经济繁荣直接带来的，而是你把所有的资源都不惜代价地用来去推动经济发展，不去照顾社会的健康平衡所造成的恶性后果。

当然，共产党政权后来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胡锦涛时代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些说法。但看到问题并不代表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和它的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国这么在乎经济发展的速度，当然大家都希望数字高一点，但是也不至于说9%才行，7%就要哭爹喊娘。他要推进经济发展，为什么要不惜代价？这个值得说说。

199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政权普遍垮台以后，中国这套体制在世界上成了孤儿，它在中国的民众甚至在官员眼里都失去了合法性。大家都觉得，全世界共产党都垮台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一套？于是，它只能靠经济发展来换取合法性。过了10年20年，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中国人忘性又大，就接受了由经济带来的这种所谓的合法性了。

可是，这两个不惜代价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如果我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权利，你还不让我们过点物质上的好日子的话，老百姓谁买账？它可以不惜代价，包括资源的高度集中，不向国民健康、教育、维持社会公正去倾斜，但还是离不开市场化的因素，那就为最近10年习近平搞的这一套埋下伏笔了。

杨:您提到的两个不惜代价也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致命缺陷,而它又跟有人所颂扬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点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揭示得非常深刻。

下一个问题是,从江泽民讲三个代表,胡温讲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他们是可能向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学习的,这些理论甚至也不排斥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中国也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尝到过甜头。这个势头没有保持下去,到习近平这就完全逆转了,要向毛时代全面倒退。您认为习近平倒退的原因是什么?

吴:你对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立场的判断,我觉得是太乐观了。

他们当然讲了一些好听的话,但共产党在不同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说非常不同的话。比如说,毛泽东在延安,1940年代抗战时期,他想和美国搞关系,自己给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很多文章,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也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就是鼓吹民主和自由。一方面他是用民主和自由来挑战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他也用民主和自由来试图讨好美国。这和国共两党以及美中苏在二次大战末期的多角游戏有关系。

杨:笑蜀编过一本书,汇集了那些文章,叫《历史的先声》,是吧?

吴:对,那就是当年中共那些文章的结集。非常讽刺的是,这本书马上就被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过去说的话,党报上过去刊登的文章,现在重新出版

也会被禁掉,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他们不想人们知道他们过去说了大谎言呢?我不认为毛在延安时代真的就是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那不过是为了某种战略目的而说的谎言。

江泽民、胡锦涛也和毛一样。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内容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这恰恰就是刚才讲的“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中国模式”如果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公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强强联合,你有钱我有权,咱们两个搞到一起,谁还能搞得过我们?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就是权钱结合的制度化。共产党敞开大门让有钱的人加入进来,这样来维持共产党的垄断资源,不仅垄断政治权力的资源,也垄断财富的资源,那就造成了所谓“中国模式”下高度的贫富不均。

胡锦涛时期对民主是什么态度?那时有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要作为独立候选人出来竞选基层的人民代表,这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可是他们都受到了打压。

在江胡时代,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不得不向世界经济体系敞开大门。在敞开大门的过程中,进来的当然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再加上信息革命,使得中国不得不和世界联网。所以,那时候的所谓与世界接轨,对当局来说其实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来强化共产党的所谓合法性。中共当局实际上不是没有对国际联系中出现的文化、社会等因素实行严厉打压,但因为和经济因素分不开,实际上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整个邓江胡时代,特别是1989年以来,中共实际上都在允许经济自由有所发展的同时不断试图控制其可能带来的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对共产党的冲击和挑战。不过,由于不得不以经济发展来维系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

于他们没有后来那样的经济实力，所以一直做得不像今天的习近平这样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有一段专门讲，10年前当他接手的时候，他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

总之，我看不到江、胡真的是想向民主国家学习，要走西方宪政的道路。江这个人比较会耍花腔，胡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出身，在这一点上习倒好一点，干脆直接，坦白而蛮横。

杨：习近平没有江和胡那么会表演，所以就蛮干，是吧？

吴：对。我刚才讲两个不惜代价之间有矛盾，这在江胡时期还没那么突出，因为共产党首先要把经济发展好，才能稳固自己的权力垄断地位。到了习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比较突出了。为了经济发展，很大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出现了。

我认为，当两个不惜代价发生矛盾的时候，无论是江胡还是习，都一定选择第二个不惜代价，那就是：就算经济不发展，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政治专制。实际上邓小平在1989年就是这么做的。当1980年代的经济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冲击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时候，他是不惜代价也要镇压的，哪怕经济三年不发展，哪怕国际上制裁，他也这么干了。

今天的习近平同样是以第二个不惜代价为中心，因为他感觉到第一个不惜代价坚持不下去了，那个代价有可能会把共产党一党专制给赔进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杨:您刚才提到,经济发展是他们的业绩所在。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带来的合法性,所以只能靠业绩来维持合法性。

如果习近平一直倒行逆施下去的话,尤其是打压民营企业,并且破坏法治,那就自然要破坏财产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这些做法都是妨碍经济发展的。而妨碍经济发展,最终就会导致它没有业绩,损害其合法性。那么可不可以说,习近平在倒行逆施到一定程度会收手,不至于让中国完全倒退回毛时代或者朝鲜那样的状态?

吴: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不是建立在经济上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是一种“伪合法性”。

在民主政治下,政府的合法性在于选民的承认。经济表现得好一点,不过是争取到多一点的选票,但并不是说经济好,总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就不用再投票选举了。所以,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经济表现好顶多只是有利于争取选票而已,不能直接认为是合法性所在。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完全不靠经济表现来维持它的合法性的,特别是毛统治的后20年,大体上从1958年到1976年是不靠经济表现的。那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愚民教育,不断地宣传毛泽东是多么伟大,生活有多好。但是我感觉这对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多大的欺骗性。那个时代我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对工人农民来说,生活好不好他自己还不清楚吗?但是,在强力压制下,人们既不可能表达,也不可能有什么选择,不过就是逆来顺受而已。

我把这个叫做“接受性的合法性”，或者叫“消极的合法性”。我并不喜欢这个政权，但我没有办法摆脱，又反抗不了，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没造反，你就认为我接受你了，你就合法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合法性。这样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

现在习近平很多方面学毛，把中国的经济搞成这个样子，很多朋友讲，经济搞差了以后，是不是社会就危机四伏，是不是共产党自己的力量也有问题了？对老百姓，习近平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毛时代饿死你们上千万人，共产党的政权还不是牢牢握在手里？饿死了以后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家都高喊毛主席万岁，都向毛泽东献忠心。现在过了几十年的不错的日子了，都实现所谓小康了，那么多城市人有房子住有车开，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怎么样？

我猜想这是习对中国民众心理的评估。但是，这个评估很可能不对。因为从坏日子过到好日子谁都容易适应，从好一点的日子过到差一点的日子，不满就非常多。老百姓有了强烈的不满，是不是就会抗议？我们看到去年12月有白纸抗议，今年以来“白发抗议”也出现了，人们已经开始对经济下滑、治理失策等表达他们的不满。

但是，习近平最后还有一招——这也是邓小平当年的那一招，更不要说毛泽东：我有强大的镇压力量。只要能够镇压，你即使有不满，难道能反得了吗？这是一个暴君、一个专制者的逻辑。我看，从经济来理解习的执政逻辑很可能是不到位的，他的逻辑是靠暴力。

再一个，习近平可能还有他的发展经济的思路，就是打压民营经济的同时发

展国营经济、军工经济。他能不能按照中国发展航天火箭这个模式，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我很怀疑这个路能走得通。当然，毛泽东时代经济那么差，也造出了原子弹，人造卫星也上了天。这些也许对所谓国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整个经济，包括对政府的财政能力，并没有什么帮助。

杨：靠国营经济和军工不可能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吴：是的。还有，他也很可能会在经济上有适当程度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打个比方，给韭菜施肥和割韭菜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吧？江湖时代很重视施肥，中国的韭菜长得蛮茁壮的。习近平捡了便宜，上来就割了一大茬。但是割了一茬后是不是还能长得好呢？看来长得不好，他现在也许给你施一点肥。但是，如果人们都看透了这个把戏，那么施肥浇水也没有用，那么经济上中共面临的挑战就会不断扩大。

即使这样，他也不会把经济发展放在高于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地位上。只要他看到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他就一定不惜牺牲经济。是经济发展服务于一党专制，而不是一党专制促进经济发展。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基本逻辑。

杨：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访谈。